



膀胱的“压力”，“但是我们无怨无悔，倍感骄傲！”

3月22日，上海急救中心援鄂的八名队员回到上海。上海急救中心援鄂医疗队队长刘轶回到上海后对记者表示，急救队离汉前的几天，反而比平时更忙了。因为武汉疫情缓解后，方舱医院休舱，武汉当地普通医院正逐步恢复非新冠肺炎的门诊，因此符合转运条件的重型、危重型患者统一向高水平医院集中。上海急救队承担了大量转运病人的工作。

回到上海集中隔离14天后，队员们最想做的是见一见分别2个月的家人。“我可能稍微休息两天，就要继续去做口岸的转运工作了。”刘轶说，上海口岸“防输入”，压力很大，队员们都希望能够尽快为这座城市分忧，保住抗疫果实。

## “命令”不断，任务艰巨

在武汉期间，刘轶习惯用“命令”这个词来描述每天接到的工作安排。

清晨睁开眼，用过早餐，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。为驻地房间和公共区域消毒、清点物资、检查队里的5台负压救护车……每一项都马虎不得。有队员专门负责检查车辆的负压值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，疫情期间，这事关大家的安全。与此同时，驻地隔壁的武汉急救中心一片繁忙，收集信息、安排车辆调度……“一般会在下午向我们下达命令。”

随着“应收尽收”的执行，这座城市向疫情发起总攻，指挥部分派任务时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区分轻重了。

“病人是担架抬上车的，需要吸氧，吸氧量已经开到最大值了。”刘轶回忆起最惊险的一次任务。转运途中，医疗舱里的跟车护士告诉他，病人的意识开始模糊，心电图显示心率不齐。好在那时，救护车已经驶入火神山医院，正排队在门口等待交接。刘轶立即用扩音器喊话，请求尽快安排。



3月22日，上海急救中心援鄂队员胜利凯旋。

“没过多少时间，几名医生跑过来，将病人推到重症监护室。”刘轶长吁了一口气，“他的生命体征还在。”来武汉前在上海转运过新冠肺炎患者，刘轶和队员们清楚，这个病恶化起来速度非常快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他们脚下的油门，会踩得更重些。

队员曾杰也在武汉遇到过紧急情况：有一次雷神山医院有个非常危重的病人，曾杰在车上等了将近三个小时。大家心里都清楚，时间越长，对重病者而言，转运风险就越大。幸好，这次转运最后顺利完成。

在武汉转运期间，偶尔也遇到难沟通的病人，上救护车后死活不配合戴口罩。遇到这种情况，队员们只能让他系好安全带，尽快送到医院，避免更多接触。有一次，队员薛凯华去转运一位危重症患者。病人是个老太太，在车上很烦躁，不停地拽氧气面罩。跟车护士只好一遍遍帮她固定。病人只能靠在护士身上，一躺下就呼吸困难。“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我多少次担心她过不去，她最终还是平安进病房了。”他有些后怕。薛凯华最多一天开了连续六个多钟头的车，先后去了雷神山、火神山、金银潭三家医院转送病人，有位病人到医院后病情急转直下，直接送进了ICU。“但只要还有生命体征，我们就很欣慰，真的，我们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”

从上海出发前，刘轶想到过很多会遇到的困难。但他没想到，最寻常的“方便”，却是队伍最头疼却绕不过去的话题。刘轶说自己一次也没穿过纸尿裤，因为不习惯。有几名队员穿上后，